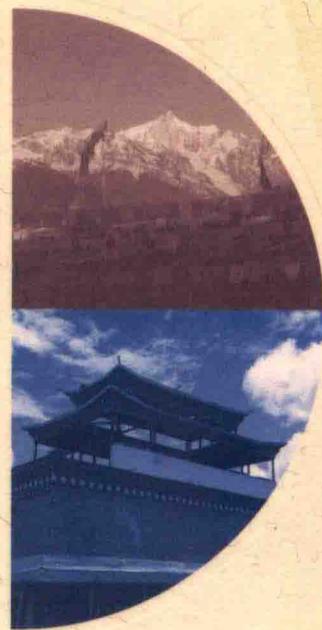


# 迪庆州民族文化 生态保护区 与旅游发展研究

郭家骥 边明社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 迪庆州民族文化 生态保护 与旅游发展研究

郭家骥 边明社 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迪庆州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研究 / 郭家骥,  
边明社主编.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222-12747-0

I. ①迪… II. ①郭… ②边… III. ①民族文化—保护—研究—迪庆藏族自治州②旅游业发展—研究—迪庆藏族自治州 IV. ①K280.742②F592.7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04059号

责任编辑：王曦云 尹杰

责任校对：石晓华 钟月辉

责任印制：洪中丽

封面设计：王曦云

书名 迪庆州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研究  
作者 郭家骥 边明社 主编  
出版者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者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3.25  
字数 370千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2747-0  
定价 58.00元

# 目 录

<b>导论：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业的发展</b>	<b>1</b>
一、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由来	3
(一) 文化生态学与生态博物馆的诞生	4
(二) 民族文化保护村与民族文化生态村的探索与实践	6
(三) 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与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立	12
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内涵	15
(一) 学术界关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认识	15
(二) 文化部的相关规定	17
(三)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条例的规定	19
三、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进展	20
(一) 申报过程与前期规划	20
(二) 建设内容	23
(三) 建设进展与成就	29
四、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8
(一) 存在问题	38
(二) 对策建议	42
 <b>第一章 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b>	 <b>49</b>
一、迪庆文化遗产概述	51
(一) 历史文化	53

(二) 建筑文化	55
(三) 服饰文化	56
(四) 民间文艺	58
(五) 习俗文化	60
(六) 民间手工艺	63
(七) 民族医药	67
(八) 宗教文化	68
<b>二、迪庆文化遗产之旅</b>	<b>69</b>
(一) 物质文化遗产之旅	70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旅	85
<b>三、存在的问题及反思</b>	<b>103</b>
<b>四、结语</b>	<b>113</b>

<b>第二章 神山文化保护与旅游</b>	<b>116</b>
<b>一、绪言：藏民族神山崇拜的文化特征与旅游的契合</b>	<b>118</b>
<b>二、藏民族神山文化</b>	<b>121</b>
(一) 藏民族神山崇拜的缘起	121
(二) 萨满教与原始山神崇拜的关系	126
(三) 山神崇拜与佛教的结合	129
(四) 史诗《格萨尔》对藏民神山崇拜的影响	131
(五) 转神山的功德	134
<b>三、卡瓦格博在藏区的地位和形象</b>	<b>137</b>
(一) 卡瓦格博神山地位的确立	138
(二) 卡瓦格博的形象	140
(三) 卡瓦格博神山的内转和外转	144
(四) 香客的人数、教派和地区分布比较	149

四、转山朝圣与旅游	153
(一) 转山朝圣者与游客相遇	155
(二) 交通方式的改变对三方都有影响	156
(三) 香客、游客与当地人的相互影响	157
(四) 转经与旅游的互动——明永村和雨崩村的巨变	162
五、存在的问题	166
(一) 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	166
(二) 自然生态的承载压力和环保问题	168
(三) 价值观念的畸变	169
(四) 本末倒置	170
六、当地文化人的努力	173
七、结语	178
<b>第三章 生态文化保护与旅游</b>	<b>180</b>
一、迪庆州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概况	181
(一) 自然生态资源	182
(二) 民族文化资源	185
二、迪庆州生态文化旅游的类型	186
(一) 国家公园旅游——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旅游	187
(二) 高山草甸伊拉草原旅游	191
(三) 冰川旅游(明永冰川)	195
(四) 动植物观赏旅游(维西塔城滇金丝猴)	197
(五) 其他自然生态旅游	199
三、迪庆州生态文化旅游的问题和建议	203
(一) 生态文化旅游存在的问题	204
(二) 对策建议	207

<b>第四章 宗教文化与旅游</b>	<b>213</b>
一、藏传佛教文化类型：以香格里拉县松赞林寺为例	214
(一) 噶丹·松赞林寺沿革	214
(二) 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松赞林寺	216
(三) 存在的主要问题	225
二、伊斯兰文化类型——以德钦县升平镇清真寺为例	227
(一) 德钦升平镇清真寺概况	229
(二) 清真寺的管理	230
(三) 德钦回族的历史与现状	231
(四) 作为文化旅游资源的学术基地	238
(五) 清真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239
三、天主教文化类型——以茨中天主教堂为例	239
(一) 茨中天主教堂概况	240
(二) 茨中天主教堂现状	241
(三) 旅游开发给村民带来的机会	246
(四) 茨中天主教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249
四、基督教文化类型——以维西基督教堂为例	250
(一) 维西基督教堂概况	250
(二) 维西基督教文化现状	251
(三)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257
五、对策及建议	257
<b>第五章 藏民家访与旅游</b>	<b>260</b>
一、藏民家访的几个场景	260
二、香格里拉藏民家访的概念和特点	270
(一) 藏民家访的概念	270

(二) 藏民家访的基本特点	274
<b>三、藏民家访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b>	<b>280</b>
(一) 经济价值	280
(二) 文化价值	285
<b>四、藏民家访的经营管理及其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b>	<b>287</b>
(一) 藏民家访的经营管理方式	288
(二) 藏民家访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博弈与问题	294
<b>五、对藏民家访可持续发展的思考</b>	<b>305</b>
(一) 树立藏民家访应使民族文化与旅游经济互动发展的观念	306
(二) 建立提升培训，培养和完善监督管理并行的机制	307
(三) 注重人性化服务和多样化经营策略，避免过度同质化竞争	310
<b>六、结论</b>	<b>311</b>
<b>第六章 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互动研究</b>	<b>313</b>
<b>一、迪庆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与旅游发展的关系</b>	<b>313</b>
(一) 迪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概况及设立的简要历程	313
(二) 迪庆旅游发展情况	316
(三)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与旅游发展的结合	318
<b>二、迪庆州旅游发展背景下文化生态保护的实践经验与案例</b>	<b>321</b>
(一) 松赞系列酒店的经验案例	321
(二) 卡瓦格博文化社的实践经验	326
(三) 普达措国家公园内村寨参与旅游的案例	332
(四) 明永村参与旅游的案例	337
(五) 巴珠村参与旅游的案例	347

三、关于迪庆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几点思考	355
(一) 迪庆文化生态保护建设与旅游发展的理论思考	355
(二) 结语和讨论	359
<b>后记</b>	<b>362</b>

# 导论：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业的发展

云南是一个有着神奇美丽的自然风光、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悠久灿烂的历史传统的地方，具有发展旅游业的天赋资源。因此，随着改革开放后人们收入的增加，休闲时光的增多，基础设施和服务条件的改善，云南便成为众多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20世纪80年代，云南的旅游业率先在西双版纳取得突破；20世纪90年代，滇西北的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异军突起，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热点地区；进入21世纪，云南的旅游热点逐步向全省扩展，滇西南的腾冲、瑞丽、沧源、西盟，滇南的元阳、河口、红河，滇东南的广南、富宁，滇中的昆明、曲靖、玉溪、楚雄和滇东北的会泽、盐津等等，旅游热点在全省四处开花，使旅游业迅速成长为全省的支柱产业，在一些旅游热点地区，旅游业甚至成了当地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与此同时，大批外来商家和投资者，也纷纷落户旅游热点地区经商办企业，与外来游客一道，把旅游热点地区炒得热上加热。迪庆州就是一个典型的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旅游热点地区。

什么是“旅游”？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认识。美国旅游人类学家史密斯从人类学角度为其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一般来说，一名游客指的是一个暂时休闲的人，他（她）自愿离开家，到某一处地方去参观、访问，目的是为了经历一种变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旅游动机，但有三个基本要素，它们形成了一个等式，即：旅游=休闲时间+可供自己支配的收入+积

极的地方认可（即对旅游目的地的认可）。”<sup>①</sup>他进一步指出：

“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活动，使人们的生活形成了一种劳逸结合的良性循环。有了工作就有了休闲的流动性，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如何使自己得到身心恢复的方式。不同的旅游方式又可根据不同的休闲流动性来决定，而这种流动性又取决于不同的游客。其旅游形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种：

1. 民族旅游：推销这样的旅游，主要是以地方‘奇异’的或常是异域的民族风俗习惯为特色，这样的旅游案例很多，如爱斯基摩人、巴拿马圣·布拉斯印第安人和印度尼西亚的托六甲人。这样的民族旅游活动主要包括到当地人家和村落拜访，观看民族歌舞和民族仪式表演，购买当地的土特产品。对艺术史家来说，部分产品有很高的内在价值。这样的旅游目标常远离‘旅游热点’，只吸引那些少数由于好奇心驱动的游客和精英游客。一般来说，游客较少的地方，主客间的影响就要少些。

2. 文化旅游：这种旅游包括参观‘如诗如画’的或具有‘地方色彩’的目的地，参观那些即将消失的‘古老’东西，如建筑、手工纺织品、牛车、马车、从事农耕活动的工具、人工制品等。具体的活动包括到乡村小饭店吃饭，观看民俗演出，观看穿着民族服装的节日表演，马术表演（这使人想起拓荒时代的美国西部）。这是一种农耕文化，我们可以从巴厘岛和西班牙的案例中看到。在这样的旅游中，东道主和游客之间的相互影响很大，因为许多到这里来的游客目的就是为了观看当地农民的生活，并把他们变成研究对象。

3. 历史旅游：这样的旅游主要是参观博物馆和教堂，如在古罗马、埃及和印加帝国，缅怀他们的光荣历史。受欢迎的活动有：由导游带着参观历史古迹，观看书上介绍过的表演及展示地方生活的戏剧等等。这样的旅游往往受到许多有一定文化层次、接受过教育的游客的欢迎。从事这样的旅游并不难，因为其目的地往往是大城市或靠近大城市的地方，这种规范化的旅游业，或者说‘旅游文化’，可迎合大量的游客，这样东道主与游客之间的接触常常是非个人的和疏远的，主要是经济上的，而不是社会性质的接触。

<sup>①</sup> [美]瓦伦·L·史密斯主编，张晓萍、何昌邑译：《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4. 环境旅游：这样的旅游往往从属于民族旅游，它吸引一些旅游精英到边远的地区去旅游，如到南极去感受一种真正完全不同的经历。由于环境旅游主要是指地理方面的，所以许多想接受教育的旅游者很喜欢到大山和农村去观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旅游中，东道主与游客之间的接触是多种多样的，这可以根据不同的地方去进行评估。

5. 娱乐性旅游：这样的旅游往往与沙滩、大海和性有联系，许多人就是因为看到这些美丽的照片而激发起去这些地方旅游的念头，还有到滑雪场，到有穗状棕榈树的海边，到一流的高尔夫球场，或在帆布睡椅上进行日光浴。这样的旅游很吸引那些想要休息或与大自然接触的游客。具体活动主要有：参加体育运动，进行温泉治疗、日光浴，还有吃喝玩乐。”<sup>①</sup>

云南的旅游可以说是囊括了上述所有的形式，不过，由于云南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具比较优势的旅游资源乃是世所罕见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生态环境多样性，因而云南的旅游更多的是民族旅游、文化旅游、历史旅游和环境旅游，具体到迪庆州就更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迪庆州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成功打造了世界人民普遍向往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文化品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促成了旅游业的异军突起和跨越式发展，成为全国最好的藏区。进入21世纪以后，迪庆州又抓住国家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机遇，经过艰苦的努力和争取，促成国家文化部于2010年11月15日正式批准了《迪庆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使迪庆州成为云南省首个、全国第10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迪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立，既为迪庆州的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又提出了严格的限制和更高的要求。本书作者在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就如何搞好文化生态保护、促成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的良性互动等问题，作一初步的研究与探索。

## 一、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由来

我国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说，在近20年我国改革开放的高速发

<sup>①</sup> [美]瓦伦·L·史密斯主编，张晓萍、何昌邑译：《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展进程中，有三个词语围绕着“市场经济”这个最热门的词语迅速升温，也成为相当热门的耳熟能详的词语。它们是：一、“文化”；二、“生态”；三、“保护”。随着新世纪的开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开展和纵深发展，这三个词语的概念及其文化内涵很快集结连缀起来，形成一个更富文化战略深刻含义的鼓动人心的词组：“文化生态保护”<sup>①</sup>。事实也确乎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不同层级的传统文化保护区或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立，国内论述文化生态保护的文章和著作不断增多，形成一股时髦的学术热潮。

## （一）文化生态学与生态博物馆的诞生

然而，将“文化”与“生态”连缀起来使用，并非自今日始，早在20世纪中叶，随着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所创立的“文化生态学”的诞生，就在全世界人类学界流行开来。针对以往流行的环境对人类社会影响解释的“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作为“环境与文化互动论”的代表，斯图尔德把生态学引入到人类学中，探讨特定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他指出：“文化变迁可被归纳为适应环境。这个适应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这一理论的中心思想，是环境与文化不是分离的，而是包含着“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谓反馈或互为因果性”<sup>②</sup>。从这个中心思想出发，斯图尔德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文化生态适应”，它是指“一个在历史上发展出来的文化在特殊的环境中得到改造的适应过程”；另一个是“文化核心”，他把文化系统的决定因素分为核心制度和外围制度，核心制度包括技术经济、社会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技术经济又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它通过文化内部的组织规律制约着文化系统的其他部分<sup>③</sup>。由此出发，斯图尔德又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研究的三个基本程序：“第一，分析文化的技术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文化如何有效地利用可获得资源为其民众提供食物和房

<sup>①</sup> 参见乌丙安：《关于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基本思路和模式的思考》，载《四川戏剧》，2013年。

<sup>②</sup> [美] L.哈德斯蒂：《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源流》，载《民族译丛》，1991年第5期。

<sup>③</sup> 何瑞福：《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述评》，载《建设中国人类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屋？第二，分析与文化技术相联系的行为模式。文化成员如何从事他们为了生存所必须从事的工作？第三，确定那些行为模式与文化系统其他方面的关系。人们为了生存所做的工作如何影响他们的态度和观点？他们的生存行为如何与他们的社会活动和他们的个人关系相联系？”<sup>①</sup>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事物普遍联系、相互作用是文化生态学的核心理念。文化存续和变迁的根源除了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外，还有特定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于是文化与环境便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起来。在文化生态学思想的影响下，1971年，法国博物馆学界的两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乔治·亨利·里维埃和于格·戴瓦兰开创性地提出了内涵与传统博物馆截然不同的“生态博物馆”概念。传统的博物馆是将文化遗产搬到一个特定的博物馆建筑中，这些文化遗产同时也就远离了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所有者。而生态博物馆基于文化遗产原状保存和保护在其所属社区及环境中的理念，使生态博物馆成为一个包罗了文化遗产及其周围的文化环境与生态环境在内的社区，使生态博物馆不仅要保护文化遗产，还要保护自然遗产。由于生态博物馆具有传统博物馆所缺乏的性质，并顺应了当代人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日益觉醒和高涨的潮流，顺应了当代要求文化遗产权和文化遗产的诠释权应回归原驻地和原住民的呼声，顺应了人类要求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因而其理论一经问世，便迅速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传播开来，成为一种有效保护文化生态的方式和途径。<sup>②</sup>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学界对外交往的扩大，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理念也随之传入中国。1986年中国博物馆学会的学术刊物《中国博物馆》杂志陆续发表了中国学者论述生态科学、环境科学与博物馆的论文，集中介绍了一批与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有关的论文和资料<sup>③</sup>。1995年，由苏东海、安来顺、杰斯特龙等人组成的“生态博物馆”课题组，提出了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戛苗族彝族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

<sup>①</sup> [美]威廉·A·哈维兰著，瞿铁鹏、张珏译：《文化人类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sup>②</sup> 参见王鹤云：《保护文化生态 激活文化遗产立体生存》，载《中国文化报》，2003年7月29日。

<sup>③</sup> 参见苏东海：《中国生态博物馆的道路》，载《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

性研究报告，得到了中国政府和挪威政府的支持并付诸实施<sup>①</sup>。这个博物馆的范围包括梭戛乡的12个村寨，在陇戛村建有资料中心，展示了当地的生活、生产习俗和民间艺术。生态博物馆的管理主要以当地社区为主，管理委员会由区级文化及文物主管部门的代表、12个苗寨的公认代表和具有相应资格的管理人员、财会人员组成。另外，还设有科学咨询小组，由相应的专家组成。在生态博物馆理论指导下，民族民间文化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得到了整体保护，当地人民对于本社区文化的重要性有了更高的认识，当地的经济、教育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随后，贵州省相继建立了贵阳市花溪镇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锦屏县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黎平县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初步形成了贵州的生态博物馆群，为贵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 （二）民族文化保护村与民族文化生态村的探索与实践

我国民族成分最多的云南省也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1998年，云南省政府和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合作，委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教授，组织清华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云南省地理研究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开始对建立滇西北大河流域国家公园进行预研究。1999年，在云南省政府和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组织下，由云南省社科院主持完成的《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之“文化模块”，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保护村（区）的概念。这一研究成果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民族文化生存面临严峻挑战的条件下，要实现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规划建设一批民族文化保护村（区）。其宗旨有二：一是将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原状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村落社区及生态环境中，并使其正常地发展和延续下去，从而唤起本民族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和文化自豪。二是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出发，在顺应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潮流，实现社区文明、富裕、繁荣，让少数民族人民在共享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保留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并通过民族传统文化在自身前进道路上的不断创新，

<sup>①</sup> 参见朱生东、赵士德：《文化生态保护区理论溯源与研究述评》，载《资源开发与市场》，2011年第3期。

实现富有鲜明民族个性和特色的现代化转型。因此，民族文化保护村不仅是旨在保护整体形成和积淀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还要把传统与现代联系起来，创造由传统走向未来的民族新文化。它既有保护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强劲功能，又有使村民接受现代文明的机制。它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条件下，为处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提供经验和样板。<sup>①</sup>

课题组认为，文化是一条流动的长河，处于永恒的变迁过程之中。我们不可能将一个民族的文化原封不动地全盘保护下来，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利益驱动的今天更是如此。我们只能将一个民族最核心的，最能体现其民族特征的，最符合时代要求的，最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事项，坚决地保护下来。所以，要做好民族文化保护工作，就必须首先对各民族的文化进行筛选与评估。而要做好民族文化的筛选与评估工作，又必须科学地确定筛选与评估的标准，以便使筛选与评估工作具有可以遵循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依据。为此，课题组提出了以下六条一般标准：

1. 对每一个民族的文化进行筛选与评估，不求面面俱到，但求特色鲜明，内涵丰厚，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2. 重点选择在各民族社会生活中仍然发挥功能与作用的活着的文化；特别关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危机和正在流失的文化；优先考虑文化积累较浅、很容易消亡的小民族文化；对于已经消亡或流失的某些重要文化，可考虑采取适当的措施在特定的地区予以恢复重建。
3. 重点选择各民族自我推崇、自我评价较高的文化事项，即那些对内能促进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对外能代表民族形象、促进民族发展的文化内容。
4. 重点选择各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生态环境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内容。
5. 重点选择各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国家统一；有利于家庭、邻里、人际关系和睦，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文化内容。

<sup>①</sup> 何耀华：《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发展综合研究报告》，载何耀华、段森华主编：《滇西北生物、文化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研究》，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年版，第377页。

6. 经过筛选确定的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内容，必须符合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的规定和要求。<sup>①</sup>

在六条一般标准指导下，课题组进一步提出了确定民族文化保护村（区）的筛选和评估标准如下：

1. 建村历史悠久，农户一般在200户左右，人口800人左右，民族文化的单一性特色或多元特色鲜明、典型、丰厚。

2. 村中有一批农民文化人及组织者，村民富有弘扬本民族文化的志向和传统。

3. 村落整体具有“文化特性”或“文化意蕴”。

4. 有特殊的自然景观、地形、地貌、地物及文物古迹作为依托。

5. 交通方便。<sup>②</sup>

根据民族文化保护的六条一般标准和设立民族文化保护村（区）的五条具体标准，课题组在长达半年多时间多次深入滇西北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滇西北迪庆、怒江、丽江、大理4个州（市）的15个县（市），规划建设60个民族文化保护村（区）的设想（参见表1）：

表1 滇西北60个民族文化保护村（区）一览表

县名	保护村（区）名
德钦县	1. 明永、西单太子雪山藏族神山生态文化保护区（包括斯农、明永、西单、雨崩4个村）
	2. 奔子栏藏族木制工艺、服饰及歌舞文化保护村（以习木贡村为中心）
	3. 茨中藏族宗教文化及葡萄酒生产技术文化保护村
香格里拉县	1. 尼西陶制、木制工艺文化保护村
	2. 红坡藏族草原生态文化保护区（包括林都、阔机达拉、租母谷、果姑、司牙、给诸6个自然村）
	3. 白地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村
	4. 尼汝及属都岗藏族草原牧业文化保护村

① 郭家骥：《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问题的若干理论思考》，载谢沫华主编：《亚洲博物馆馆长和人类学家论坛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② 何耀华：《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发展综合研究报告》，载何耀华、段森华主编：《滇西北生物、文化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研究》，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年版，第377页。